

吴先生是我崇拜的偶像

邓纯章

(1940~)，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，高级工程师。

1972年初，“文革”中全国各地的老干部被“解放”，杰出的中科院院士、昆明植物所所长吴征镒先生，还没有被恢复到植物所主要的领导岗位上，而被当时的“革委会”安排去抓生产。吴先生应用手中仅有的一点权力，以高度忘我的精神，不分昼夜和节假日（年初一也见他进办公室），拼命工作，为恢复科研秩序，他多次分别召开研究室、组全体会议，动员科技人员归队，指导、协助制订大大小小的科研计划。

先生对“文革”几年来粮食增产低于人口增长，粮、油供应紧张的情况十分担忧，动脑筋召开与农业增产有关的专业会议。在多次土壤组全体人员的会议上，他特别强调当前土壤研究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紧迫性（当时全国的农业院校已被关门下放或搬迁到农村），先生要求我们立刻下乡调查，寻找课题，解决问题。

在我们去文山、红河、玉溪调查回来的汇报会上，先生得知上述地州不知何原因发生大面积“玉米花叶病”而减产和死亡时，立即指定土壤组组长柴闇设计盆栽和田间试验方案。试验结果证明，该病是由于当地土壤缺锌引起植株代谢失调导致的（论文发表在《土壤》1975年第2期，成果获云南省第一届科技大会科技成果一等奖）。

正当我们努力在省内外推广“锌肥”的1976年，刚过清明节，“四人帮”就掀起了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的恶浪。努力抓科研出成果的吴先生，被诬陷为右倾翻案的头头。而吴先生却高风亮节，坚持抓科研，出成果不动摇。借云南日报的征稿，先生要我以“玉米缺锌”成果研究的曲折过程，写一篇肯定这几年工作成绩的文章。我在文章的首段，就写明“这项科研成果是在所领导的指引、帮助和支持下取得的”。对从不过问这项工作的“革委会”，在整篇文章中都未提及。先生亲自到我的单人宿舍，仔细看了一遍文章后说了一句“就这样发表”，文章后被段亚华副所长交云南日报当月发表。

吴先生遭到“夺权者们”接踵而来的残酷打击，一天中饭后，先生被通知进城开会，一到停车场，先生发现势头不对，正好我要出差准备去赶公交车，路过停车场，吴先生叫我一同上了吉普车。一出大门，几个大汉就骂吴先生是“死不悔改的反动学术权威”。他们颠倒黑白，我实在看不下去，我说：“右倾翻案，吴所长没有时间，也没有责任。”他们一下被懵住了，没想到我这个平时跟大家关系都比较好的普通群众，竟敢顶撞他们，打乱了他们的原计划。几天后，我出差回所，刚进办公室，上次同车进城的一个人就出现在门口，通知我立刻到生产组。才进门，生产组长就说：“你站在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立场上，支持所里的右倾翻案头头，你有严重的错误言行，必须写一份思想检查，否则停止你的工作。”我坚决不承认搞科研出成果有错，没写检查。两个月后，“四人帮”被捕，在批判大会上，所领导安排我发了言，“科学的春天”终于来到了。

先生一生做了很多培养、教育、帮助青年人成长的好事，先生鼓励我在美国学好技术，我主持研究的“水稻缺硫”的成果，也得到吴先生的夫人，我的室主任段金玉教授的很多指点，经吴先

